

WORLD  
READING DAY  
阅 读

故乡是心灵的原乡

◎周飞

《远庄》是陈忠坤先生的一部乡土长篇小说，故事发生在闽南地区一个叫“远庄”的渔村。小说将地方风光、民俗习惯与人性挣扎融为一体，描绘了一幅充满烟火气息的乡土画卷。

作者以海娃鲲鹏仔的视角讲述故事，表达了绵长的乡愁。美姑、阿春和胡哥，是小说中的关键人物。美姑人美心善，和胡哥情投意合，两小无猜。然而，她却被迫成了阿春的妻子，胡哥决定南下打拼，誓要出人头地。阿春因一次立功被推选为“代公”，带领村民出海捕鱼，大家互帮互助，日子越过越好。

时隔九年，胡哥衣锦还乡，兴办产沙场，受到乡民的崇拜和拥护。在工业快速发展的事实面前，阿春憋着一股劲，更加卖力地出海捕鱼，有一次遭遇恶劣天气，不幸葬身大海。胡哥为了提高产沙量，不惜以破坏环境为代价，造成诸多悲剧，被村民举报后受到了应有的惩罚。失去沙场工作的村民，却对举报者心生怨恨。这一系列情节环环相扣，矛盾冲突层层递进，生动地展现了人性的温情与复杂，以及生命的美好与莫测，让读者深刻感受到命运的无常与生活的艰辛。

在小说中，作者巧妙地运用散文化的笔法，在悲欢离合、爱恨情仇的关键处，借鲲鹏仔之口揭示小人物身上的人生况味，使个人命运与村庄前途相互交织，映射出时代的变迁。时隔数年，当美姑与胡哥再次相遇，书中写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要走。或许，我们只是在某个转角，为彼此稍微停留，但那也只是暂时的，最终，我们都得沿着自己的路，向着不同的方向走去。”书中一处处内心独白彼此呼应，体现了鲲鹏仔心灵的成长，一次次触动我的情弦，引发深远的共鸣，堪称点睛之笔。

这部小说的语言也很有特色。陈忠坤先生是土生土长的闽南人，他将闽南文化巧妙地融入故事，把乡愁表达得淋漓尽致。书中有“替手”“水丁当”“无外久”等生动有趣的方言，有《巧芽芽》《天乌乌》《土沙耶耶飞》等韵味悠长的童谣，还有“清屯”“拜妈祖”“小定大定”等流传多年的民俗……这些地域元素，有的流露出人们对传统思想的坚守，有的反映了人们对现实困境的突围，极大地丰富了作品的文化内涵，折射出人物的精神世界。

《远庄》不同于其他歌咏乡土风情的作品，它对传统农业文明的裂变与重构作出了理性的思考。陈忠坤用文学的方式向我们证明：真正的发展，从来都不是以遗忘为代价。那些深埋于地下的传统文化根系，恰恰是现代文明向上拔节不可或缺的营养。

《远庄》，是一幅描绘渔村变迁的历史长卷，是一首咏叹故乡情结的动人诗篇，是一曲激励生命韧性的深情赞歌。无论时间过了多久，无论我们走了多远，无论历经多少风霜，故乡的一草一木、一朝一夕、一人一事，始终会让我们魂牵梦绕，因为故乡永远是我们精神的底色、心灵的原乡。



人的一生始终与锅、碗、瓢、盆等各种器物紧密相联，左右不离，诸如睡觉要床榻，吃饭要碗筷，缝衣要针线，农作要耒耜，远出要桥船等等。近读著名作家、江南文化学者徐风的《江南器物志》一书，让人大开眼界，感触多多。这部堪称江南版的器物“清明上河图”，活灵活现地描绘了人与各种器物的生动互动过程。

一幅江南版的器物清明上河图

◎汪志

的创作初衷。

“器物是人们无声的忠实陪伴，它储存过往，冷观当今。”不同于博物馆橱窗里的静态陈列，徐风笔下的器物始终与人的体温相依偎。在他的笔下，官人、细民、文士、商贾、民女、捐客、丐徒等轮番登场，由人写器，由器观世。通过追究民间一件件不同器物的起始、传承、流变，指向背后的文化特质与文明菁要，乃至中国传统文化在江南土壤中的根系与旁通。细读这本书，它如同一幅生动的江南版文字《清明上河图》，通过对器物的细致描绘，展现了江南丰满文化的独特深厚底蕴。

在《江南器物志》一书中，徐风通常从两个方面来书写“器物”。一是器物制作、使用过程里的感官体验。在这里，他的表达力求令读者身临其境“美”的产生，进而领悟人与器物之间富有生命力的互动。如在《瓦片翻身记》中，汤效祖的恩师兼准老岳父颜文泰，为支持汤效祖乡试赶考，特地准备了四件器物：鸡翅木折叠油灯、青云剑、砚台和竹编考篮。汤效祖带着这四样器物赴金陵赶考，灯以照人、剑可鼓气、砚能启笔、篮能保生，最后果真中了举人。这其中的考篮制作要“细竹刀”“刀刃游弋”“竹片跳来晃去”，是“手—物”的完整动态过程。徐风通过勾勒出每件器物的形态、质感与使用感受，让“器”的交接也承载人情。

二是器物使用过程里的叙事功能，引器物入人事，通过述说器隐镇居民“或纠缠于器，或困扰于物”的故事，将器物的历史“显化”，与江南文明产生关联。书中《龙骨水车》讲述器隐镇车水巷农民郑龙

它以江南“器隐镇”为背景，从科举、稼穡、节庆、风俗、嫁娶、餐饮、庭院、家具、服饰、舟车、礼品等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用10个故事单元切入古镇民生，书写南方温润而又激烈的山水间那些人与物、器与神之传奇，向我们展现出了一幅由“匠艺”层面再深入“文心”内核的徐徐大幕及创作谋略，“托江南之名，借器物说世”。

徐风，国家一级作家，中国作协会员，江苏省宜兴市文联副主席，现生活在被称为陶都的中国陶瓷历史文化名城宜兴。出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的徐风，从童年时代与外公在陶瓷店守夜开始，他就对各类陶瓷器物有了较深的印象。徐风的外公是一家陶器店的老员工，陶瓷店就是一个器皿大世界。在诸多的器物环绕中，在来来往往的各色人群中，徐风逐渐学会了和外公一样用一把茶壶喝茶，并领悟了很多器物方面的专业知识，同时也看到了众多器物背后的民生百态——正品的陶器比较贵，一只碗要1毛钱，而次品只需要6分钱，这省下来的4分钱，对那个年代的普通人来说，可以买一到两支铅笔，还能打小半斤的酱油呢。

作为从小与各种紫砂陶器接触的徐风，在心灵深处渗透了紫砂精神之后，徐风愈加感受到世间其它各种器物的重要性。在他看来，紫砂还不能代表江南文化的全部，其它的器物，特别是老百姓一直在使用的老器物，便逐渐进入了他的创作视野。书写一百多年来江南古镇上老百姓的“器物生活”，丈量器物脚下的土壤，以及器物背后的世道人心，是徐风《江南器物志》

杨绛的百年人生智慧

◎杨力

在这个崇尚速成的时代，杨绛先生以105年的生命历程诠释了何为真正的卓越。《杨绛传》不仅记录了一位知识分子的百年人生，更展现了一种超越时代的生活哲学——在平凡中追求永恒，在淡泊中成就伟大。

淡泊明志：知识分子的精神底色

杨绛生于1911年，成长于新旧交替的时代洪流中。父亲杨荫杭是著名法学家，母亲知书达理，这样的家庭培养了她“不争”的品格。当同龄人追逐时髦时，年轻的杨绛却沉浸书海，她说：“天下好东西多着呢，不可能样样都有。”这种对物质欲望的克制，成为她一生的精神底色。

杨绛的淡泊尤其体现在她对名利的超然态度上。当西班牙政府因她翻译的《堂吉珂德》而邀请她出访时，她最初婉拒，认为“没有必要”。她从不参加自己著作的签售会，认为“把稿子交出去，关于怎么卖书，就不是自己该管的事了”。这种态度在当今文坛尤为珍贵，它提醒我们：真正的学问应当超越功利，回归本真。

坚韧不拔：逆境中的精神高度

在特殊年代，这位优雅的知识分子被剃阴阳头、罚扫厕所，却依然保持着惊人的精神定力。她将扫厕所视为“一份正常的工作”，认真完成；用自制的假发遮掩被羞辱的痕迹，哼着歌拎着菜篮子出门。面对不公，她没有崩溃或反抗，而是以沉默的尊严承受一切。

杨绛的坚韧更体现在学术追求上。即使在最艰难条件下，她依然坚持翻译《堂吉珂德》，前后历经十多年，有时一天只能翻译500字左右。当原译稿在动乱中丢失后，她没有放弃，而是重新开始，最终成就了被公认为最优秀的中文译本。

爱的艺术：婚姻与家庭的智慧

杨绛与钱钟书的爱情故事，已成为中国知识界的佳话。1932年在清华园，钱钟书一句“我没有结婚”，杨绛回应“我怕没有男朋友”，从此“两人便是一眼万年”。钱钟书称杨绛为“最贤的妻，最才的女”，认为她“绝无仅有地结合了各不相同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

在婚姻中，杨绛展现了非凡的智慧。这位出身名门的才女，甘愿

大的一生，他的生命几乎就是一部独属于江南水乡的器物志。正月畧坑的麦锄、春农的耕犁、麦收的筛谷匾……郑龙大无一不精、无一不晓。七八月旱期，龙骨水车匍匐在河岸与水田间运转，正如它的制作者郑龙大在田垄上为农事奔走。引河水入稻田离不开龙骨水车，一如车水巷的人们离不开郑龙大。他和村民用朴实的农具撑起了器隐镇的农业民生。笔者出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读罢此章节，不禁让我回想起了儿时和家人在安徽老家农村常用水车引河水入稻田的往事，仍历历在目。

据悉，徐风的这本《江南器物志》一书未出版之前，由上海的《收获》杂志“江南器物”专栏连载，2025年7月，译林出版社正式推出了《江南器物志》，图书一经面世，当月即入选了“中国好书”月度推荐书目、《新京报》书评周刊主题书单、百道好书7月榜、《文学报》好书8月榜等多个图书榜单。同时入选了2025年度江苏省重大题材文艺创作重点项目，堪比精品力作。

“器有骨骼，物有灵性。”器物与人之间悠长细密的故事，由此静静蛰伏在作家心中。这本书虽然叫《江南器物志》，但它绝对不仅仅写器物，而是写人如何造器，器如何渡人，人与器的相互成全，它不仅复原了江南绚丽多彩的传统生活，也让当下中国人的生活得到了丰盈的折射。正如《收获》原主编、浙江工商大学教授永新在“江南器物”专栏开栏时所说，“百姓日用为道”，器物只有包裹在世俗的烟火中，在老百姓的日常生活里，才有光彩，才有精气神。

为丈夫洗手作羹汤。当清华规定夫妻不能同时任正教授时，她毫不犹豫自降为兼职教授。在女儿钱瑗和丈夫相继离世后，八十多岁的杨绛独自“打扫战场”，整理钱钟书浩繁的手稿，并写下了《我们仨》。

丰富的安静：跨越世纪的生命启示

晚年的杨绛过着近乎隐居的生活，却依然笔耕不辍，104岁时还出版了中篇小说《洗澡之后》。她的居所简朴至极，却承载着一个丰盈的灵魂。正如周国平所说：“人生最好的境界，是丰富的安静。”

在生命的最后阶段，杨绛将她和大丈夫的稿费全部捐给清华大学“好读书”奖学金，且坚持不以自己的名字命名。这种慷慨与她个人的节俭形成鲜明对比——她总穿旧衣，脚上的鞋甚至是已离世女儿穿过的。

《杨绛传》记录的不仅是一个人的百年历程，更是一种生活态度的示范。她曾说：“我们曾如此渴望命运的波澜，到最后才发现，人生最曼妙的风景，竟是内心的淡定与从容。”这句话或许是对她一生最好的注解——在平淡中追求卓越，在安静中成就永恒。